

要 目

国难、家难与革命

闽北临委及机关旧址简介

鼓顶岩十三壮士

孙中山奉安纪念在建瓯

档案春秋

建瓯古厝桥

话说芝城小贩

政协六、七届委员名单



建瓯文史资料

目 录

纪 念 建 党 七 十 周 年

- 国难、家难与革命……………陈 英（1）
- 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及其机关旧址简介…
……………方 立（9）
- 难忘的往事……………杨 柳（15）
- 诗词……………徐恭宜等（18）

剿 匪 斗 争

- 鼓顶岩十三壮士……………范忠健 毛祥生（21）
- 有关阳泽乡常全等烈士的资料……………徐志耀（25）
- 从“应变会”到剿匪镇反……………施大刚（31）

辛 亥 革 命 八 十 周 年

- 民初纪事……………杨旺泉（38）
- 辛亥革命后建瓯地方体制变革……………陈子荫（43）
- 国民革命军一张文告……………陈长寿（47）
- 孙中山奉安纪念在建瓯……………张士英（49）
- 奉安大典与仁丹广告……………陈长寿（53）

太平天国起义 一百四十周年

- 太平军攻打建宁府……………潘 芳（55）

档案 档案春秋……………徐志耀 (62)

史志 解放前建瓯修志情况略述……………潘渭水 (72)

人物传记 临床济世七十年……………罗绍伦 (76)

乡镇资料 建南高峡出平湖……………张家荣 (81)

建瓯古厝桥……………潘芳 (88)

建瓯墟市史话……………林桂芳 (92)

话说芝城小贩……………林德发 (100)

工厂小史 建瓯茶厂四十年……………蒋小芝 叶兴渭 (111)

福茅飘香……………李梦祥 (117)

建瓯蜡纸原纸初创史……………饶鸿光 (125)

政·协·动·态

建瓯县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及工作组成员名单……………

……………林桂芳 (129)

建瓯县政协活动纪要……………林桂芳 (152)

建瓯文史出版十年概况……………文史委员会 (173)

国难、家难与革命

陈 英

对一九三八年赴 延安参加革命的回忆

今年是党的七十周年纪念与抗日战争五十四周年纪念
日。也是我从沙县福一中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参加中国共
产党五十四周年的日子。五十四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
瞬间，可是在我生命旅途中却是漫长的一大段。我幸运的在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能继续参加
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建设，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
繁荣兴旺，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家乡建设的日新月
异而感到无比的高兴。虽然我已年逾古稀，离休了，我将竭
尽全力，为人民为家乡做一个老共产党员所能做的一切。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侵
略，这是无数历史事实与国际国内反复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我的切身体会也是如此。

当我还在后街（今中山路）小学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东

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以后不断听说东北同胞被蹂躏烧杀，到处流浪的悲惨遭遇。当“流亡三部曲”传来以后，更加使人悲愤，使我童年的心灵里，埋下了打日本、报仇雪恨的火种。记得在高小时，级任教员杨敬村组织学生讲演会，我就讲了读好书，学好本领，准备打日本的话，杨老师听了很高兴，给我题写了“语术之花”的奖励。我还和扬万年、曹坚等同学组织童子军（高小有童子军组织）野营和在学校操场、课堂里也搞夜间露营，分日本侵略军和抗日军两组，劫营抢营游戏练习。当时我因家境不好，我和弟弟是仅有的两名住校小学生。上瓯中以后，一直没有见过杨老师，听说他后来被捕了。不管他后来的表现如何？在当时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教师。解放后我回家乡见到他，叫他杨先生，他说不敢当。我说你当过我的先生这是历史事实。他对我的思想有启蒙影响。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更加疯狂，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也一样，日货充斥市场。抵制日货，不仅在全国，就是建瓯山城也很快展开，我们学生也上街宣传，喊抵制日货的口号。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抗日的消息传到建瓯后，大家议论纷纷，精神振奋。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号召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在建瓯知道的人较少，没有什么活动，但在我

们同学谈论中，觉得这样做，抗日救国有希望了。我为了要更多的知道抗日救国和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除了到学校图书馆看报纸杂志外，又到林铎同学父亲开的书店里买邹韬奋编的《生活》、《抗战》等刊物，及艾思奇编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进而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日本河上兆的《政治经济学》、《陈独秀文选》等。我已开始从学校的课本里走出来，眼界更加宽广了，脑子里更多的想国家兴亡、民族危亡、社会革命、共产党等问题。

芦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共产党的宣言、号召和主张我们无法看到，只是从其他报纸杂志上读到一些；国民党蒋介石高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给了我很大的希望。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占领了平、津，接着就大举进犯上海，直逼南京，扬言三个月要灭亡全中国；以逼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当日本帝国主义用海、陆、空大举向上海进攻的时候，上海军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激烈的“八·一三”抗日救国守土大战。战争开始打得很好，给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增添了新的勇气。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上海沦陷了。上海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日寇的侵略离福建更近了，建瓯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始有所活动。我们是瓯中的最后一个高中班（因瓯中要取消高中准备合并到省一中去），我当时是学生会的负责人，

我提议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得到杨万年、黄子恭、叶康参、毛步松等同学支持。宣传队到过吉阳、南雅、上党、徐墩，回来以后又在城里大市街皇殿、前街戏院宣传演出。开始只是演唱抗战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以及“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剧，以后演多幕话剧“梦残花谢”，描写一群青年学生积极抗日，其中有一女生被一银行家所欺骗，不想抗日而想过醉生梦死的生活，结果梦残花完全破灭了。参加演出活动的除同班的杨万年、黄子恭，女同学刘静贞、刘淑贞外，还有黄葵、梁莺倪老师等。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失守，上海流亡学生组成了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姓费，年纪较大，南下来到建瓯。他们没有活动经费，吃住无着落，我们学生会出来帮助；建瓯县抗敌后援会帮助，抗敌后援会说没有钱，我们就帮助该团在皇殿义卖宣传，筹集经费。在演出前国民党县党部还来干扰，由于我们同学和该团团员们以抗日救亡的大道理尽力争辩，才使他们散去。由此看来，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口号並沒有兑现，言行不一，全民抗战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流传着“三民主义，说天说地”，指其不着实际。尤其是把主张抗日救国的上海邹韬奋、沈钧儒等七君子逮捕入狱，轰动全国，引起极大的不满。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所作所为则是言行一致的，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瓯中取消高中后，我们就合并到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去。

福一中因敌机的轰炸，迁移到沙县，我们就在沙县孔庙上课住宿。新到一中，学校的教师、同学都不熟悉，地方也不熟，军事教官、训育主任和校长对学生都控制很严很厉害，什么救亡活动都不准搞。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建瓯来的同学实在坐不下来死啃课本。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成立读书会，吸收原福一中的同学参加，他们当中也有关心抗日救亡的进步同学，愿意多看些过去看不到的进步书刊。同时秘密的给校长写了一封威胁信，把信寄到福州黄子恭家，然后由福州再寄回沙县，警告校方不能阻止学生到校外做抗日宣传，否则我们抗日锄奸团就要采取对汉奸一样的断然行动，并盖上由张邦孝同学刻的肥皂图章。不久，校方可能是接到此信，就假惺惺的宣布，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学校是此地最高学府，礼拜天可以到校外向当地同胞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但不能影响功课。同时又散布沙县离抗日前线很远，可以安心读书；福建是有福的地方，福建、福州、福清、福鼎、福安等等，福字很多，不用害怕。学校宣布以后，我们很高兴，就组织起来，到校外做宣传。其实这是校方的诡计，从中他们察觉到信是我们写的，采取了各种方法来打击威胁我们，尤其是对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已无法继续在校读下去了。我和建瓯几位知心的同学商量，我决心去延安参加抗日，叶康参不同意，希望我留在一中，不要放弃这个阵地，杨万年、黄子恭愿意和我一起去。到临走时

万年提出，他父亲是酿酒工人，五十多岁了，还有四个弟弟，如果今后有个三长两短，家里无人照顾，所以不能去；子恭说他是母亲守寡抚养长大的，走了对不起他老人家，也不能去。我说你们的情况我都清楚，不去也好。但我和你们情况不一样，我就是高中毕业也无法上大学，做工作也养不了家，所以我还是决定一个人去。

我之所以要孤身一人去延安，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抗日救国的烽火燃遍全国，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几年来我一直宣传鼓励同胞们要积极动员起来，投身到抗日救亡中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自己却不管民族危亡，坐在课堂里读书，实在与心不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常向同胞宣传的话，自己到底实行不实行？是口是心非，还是自欺欺人？这是国难当头所逼，也是学校、国民党蒋介石不许人民起来抗日所逼出来的。

我要坚决一人孤身去延安的第二个原因，不仅是国难当头，还有家难当头。国难家难？不仅要救国还要救家，国难不解，家难何时了。国破与家亡是息息相联的，我不仅要抗日还要革命。从我已经学到的看到的，我完全了解：抗日救国靠国民党不行，社会解放、救穷人出水火，靠三民主义不行；只有靠共产党、靠共产主义才行。所以我要去延安跟共产党抗日，跟共产党革命。十几年来我家庭的遭遇已使我有足够的亲身经历，的确是穷则思变，无产阶级是受压迫最

深、最痛苦的阶级，所以革命最坚决最彻底，只有其他受压迫的各阶层都解放了，他才能解放。我的家难史也是数不清的：从十来岁起，父亲在老家杨墩呆不下去了，把刚生下的女儿送给了人后就带着全家到城里来做零活，母亲替人洗衣服，並靠借债度日。后来没有办法又把妹妹给人做童养媳。此时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养不了就送到县前育婴堂门外，以后一直没有下落。贫病交加，母亲病了没有钱医治，死了没有钱买棺材，不能下葬，后来因得到黄子恭同学的资助，才凑合出了丧。妹妹因受虐待，求人帮助判回来后，和弟弟一样上学困难。学校给我三块钱一个月的清寒奖学金难以维持，由于万年同学及其父母的帮助，住在他家一两年。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我上学上不起，即使高中毕业了，去工作也养不起一家，更无法供养弟妹上学。我恨旧社会，从当时我所知道的，只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国家才有希望，穷人才能翻身。因此我决心不顾一切，孤身一人去延安。前几年，老同学叶康参去世前，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一节就是写的我（杨金诺）从福一中出走的情况。

五十四年过去了，我能幸运地活下来，看到我们国家、家乡的欣欣向荣，兴旺发达，国家在国际上能有如此高的地位，人民能如此安居乐业的生活，特别是在“六·四”暴乱”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在东方屹立，使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充满信心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道

前进，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和我们搞贸易、打交道，不得不到我们国家做买卖赚钱，去解决它们的困难，给它们国家的百姓谋得一些好处。已经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从我们这里看到了他们将来的希望，摇摆不定国家的党和人民纷纷向我们取经。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幸福美满的未来。

（注：陈英原名杨金诺，建瓯县丰乐乡杨墩村人，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正军级）

中共闽北临时 委员会及其机关旧址简介

方 立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的大屠杀，使生气勃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损失，全国六万多党员只剩下一万多党员。福建省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革命团体也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从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27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被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305人，被杀害的有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徐琛等569人。（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革命纪事》42页）国民党的野蛮屠杀并没有吓倒和征服福建党组织和福建人民，“他们很快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派陈昭礼、陈明回福建恢复党的组织。“八七”会议当天，中央决定并信至福建：闽省暂时

划分闽南、闽北两区，福州、南平、邵武、建宁所属为闽北，各设临时委员会。闽北临委直属中央，书记陈昭礼，组织潘作民、宣传季康。陈昭礼，福州市人，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后留在中央工作，七月受中央委派，由武汉经江西到达闽北，先在崇安召开全县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八月初到达建瓯，和原先已在建瓯的潘作民、季康汇合后，正式建立了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

中共闽北临委在建瓯成立并非偶然。建瓯县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又是闽北最早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县分。历史上建瓯人民举行过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军入闽的第三年）因为反抗清王朝的统治，遭到清军“血刃三日”的大屠杀，过后建瓯城关几乎人烟绝迹，一片惨景；“官廨佛寺民居成灰烬；男妇投水火死者殆尽”1940年鸦片战争后建瓯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未平息过。规模最大，时间最久莫过于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史称“建宁教案”的反帝爱国运动，建瓯城关和四乡民众敌忾同仇，全城罢市，聚众毁教堂医馆，自夏及冬，延续数月之久。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建瓯人民进行的反军阀反帝的斗争连绵不断。1915年的反对《二十一条约》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建瓯人民都奋起响应，迅速汇入全省全国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大洪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京求学的一批建瓯青年在党的影响下，自己并带动

一大批家乡的爱国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学学生杨峻德和北京大学学生葛越溪在北京筹办了《建声》半月刊，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抨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1922年杨峻德等组织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发表成立《宣言》，提出“改造社会、打倒一切恶势力”。1926年7月北伐战争前夕，在北京、上海入党的建瓯籍青年葛越溪、潘作民、杨峻德、翁树年等受党的指派回闽，策应北伐军入闽。在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建瓯支部，支部策反省警备第二混成团易帜成功，为国民革命军二军六师入瓯扫除障碍，并取得歼灭北洋军两个团的胜利。六师12月进驻建瓯，在师党代表肖劲光的支持下，支部领导各界群众推翻了军阀政权，斗争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工农革命运动，提高了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支部领导各群众革命团体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政变发生后支部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保存了力量，又想方设法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为中央在“八·七”会议前后恢复福建党组织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创造了条件。

中共闽北临委在建瓯成立后，恢复和发展了闽北各地的革命力量，这是闽北临委的一大历史功绩。书记陈昭礼在来瓯途中建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后，8月又将建瓯支部扩充为县委，还建立了共青团建瓯特别支部。党团员数量都有较

大的发展，这时的中共建瓯县委下属5个党支部，党员近100名，比政变前增加四倍，增加的党员中，有来自福州、漳州被国民党通缉追捕而撤退来瓯的党员，但更多是本县本地的拥护革命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而新入党的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共青团员也增加到20余名，全是在校的中学生。闽北作，临委又从建瓯先后派出葛越溪、杨峻德、彭信等去福州市。福州市被破坏了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临委召开各地负责人会议，决定改组临委，委员由三人扩大到五人，除原三人外，增加了共青团翁树年和农民某某加入临委，会议还决定成立临委福州、延平两个办事处。稍后，书记陈昭礼根据中央的“闽北中心应渐移福州”的指示，到福州市成立了临委福州办事处，葛越溪任办事处书记。

闽北临委的建立是闽北乃至福建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福建的革命低潮已经过去，从此步入举行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行红色割据的革命新高潮。“八·七”会议当天，党中央即紧急致函闽北、闽南两个临委，明确指出，福建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闽北临委贯彻了中央的指示，所属的党组织相继转向农村，深入开展秘密的农运工作。徐履峻、陈耿、杨峻德、杨则仕、季康、潘杰民、葛道亮分别在崇安上梅，建瓯城郊、上屯、霞抱、丰乐以及水吉、政和风

池等地组织农会，开展减租抗税和拘捕官匪合一的民团头目和土豪劣绅。1927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闽北、闽南合并组织中共福建临时委员会后，统一和加强了领导，全省革命斗争进一步向前推进。1928年1月23日建瓯上屯农民首先举行暴动，夺取了民团的枪支，处死了官匪合一的民团头目，接着全省各地，如平和、龙岩后田，上杭蛟洋、永定、崇安上梅都相继举行了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打击，为福建举行更大的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中共闽北临委机关设立在建瓯县芝城镇序五里（今7号）刘葆彝故居。刘葆彝，建瓯县人，1903年生，1923年中学毕业后入北京郁大文科，1924年转考入北京工业大学，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时年24岁，1927年4月，烈士生前好友、同窗崇安人潘谷公（福州《民国日报》总编、国民党左派）衷至纯（《民国日报》副总编，共产党员）二人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追捕撤退来瓯，暂居烈士家中，8月，闽北临委书记陈昭礼携夫人潘超人来瓯组建临委，潘超人是潘谷公之女，和烈士亲属关系融洽，且烈士故居环境条件符合建立党的秘密机关的要求，不处闹市却四有去处（故居地处五通巷，1929年为纪念烈士，将烈士故居所在的一段路以烈士之字“序五”为巷名）便于隐蔽和分散，所以陈昭礼决定将临委机关设在这里。烈士原居面积较大，现在辟为临

委旧址纪念馆的仅是故居花园中的书厅，书厅是烈士生前亲自设计的西式两层土木建筑，临委机关和陈昭礼夫妇即居住在这里。解放后，烈士亲属分赴各地工作，缺人管理，1959年建溪水库上马，这一带民房均拆迁仅留书厅一处。1984年烈士亲属刘葆康、刘静贞、刘淑贞、刘荣贞等出于对党热爱之心，自愿将此书厅无偿捐赠给政府，1985年建瓯县人民政府按原貌进行改建，1986年开始展出，一楼为临委及烈士事迹，二楼为建瓯革命史简介，自展出后，各界群众纷纷前来参观，接受党史教育，展出更得到许多革命老前辈的好评，为临委旧址题词的有：饶守坤（原济南军区司令员）、黄知真（原湖北省省长）、程序（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英（原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张一凡（原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老同志。今年4月17日《福建日报》一版刊登，福建省人民政府将闽北临委旧址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纪念建党70周年，建瓯县党政六套班子于5月29日到旧址听取主管单位会报，决定更好的进行展馆布置，迎接建党70周年，让本县各界群众前来参观学习，并决定进一步完善旧址的有关设施，妥为保护管理，充分发挥旧址这一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